

DOI: 10.12046/j.issn.1000-5285.2019.06.00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化意蕴 与民间外交传播路径

李昕蕾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山东济南 250100)

摘要: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是应对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格局中中国话语缺失的迫切需要, 更是我们把握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战略机遇期的必然选择。基于人民主体的灵活多样的民间外交可以作为官方外交的有益补充, 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亲民方式推进生态文明话语的国际扩散并提升国外民众的广泛接纳度。目前, 我国民间外交在推进生态文明话语传播过程中仍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复合性挑战。为了提升民间外交在推进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中的能动性作用, 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提升民间外交的传播能力并推进传播路径创新, 这包括生态文明国际传播中民间外交的参与保障机制创新、生态文明话语传播领域及传播方式创新以及生态文明长效性传播平台建设的模式创新。

关键词: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民间外交; 国际传播; 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85(2019)06-0019-10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概念并强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维度。这意味着我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界定与理解不能仅限于国内, 而应有全球视野^①。目前西方学界日益关注“生态文明”作为中国主流政策阐述如何推动中国特定形式的创新性可持续发展模式及其对于世界的影响;^② 中国学界也开始探讨生态文明理念国际化传播过程中所面临的话语挑战与实现路径等问题。^③ 不能忽视的是, 我国生态文明思想在对外传播中仍面临着“西强我弱”的话语权格

收稿日期: 2019-07-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之子课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与合作实践研究”(18ZDA003); 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年团队项目“全球治理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权建设的外交机制研究”(IFYT18027); “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

作者简介: 李昕蕾, 女,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环境政治理论、全球环境与能源治理、生态文明研究。

① 郁庆治 《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理论的十大基础范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4期, 第18-28页。

② See Sam Geall and Adrian Ely, “Narratives and Pathways Towards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8 Dec 2018, pp. 1-22,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terms>, accessed on 17 Jan 2019; Mette Halskov Hansen, Hongtao Li, Rune Svarveru,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terpreting the Chinese Past, Projecting the Global Future”,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Vol. 53, 2018, pp. 195-203. C. P. Pow,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Through Green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Aesthetic Governmentality in Chin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Vol. 108, No. 3, 2017, pp. 1-20. Jorgen Delm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in Hangzhou: New Pathways to Green Urban Development?”,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Vol. 16, No. 1, 2018, pp. 1-21.

③ 参见王全权、张卫 《我国生态文明的对外传播: 意义、挑战与策略》,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5期, 第155-159页; 刘立成、熊莉军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全球传播体系构建》, 《学习月刊》2018年第9期, 第11-14页; 李昕蕾 《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其国际传播》, 《中国生态文明》2018年第5期, 第88-90页; 华启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生态文明建设话语体系图景》, 《湖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第1-7页。

局,西方社会对中国模式的意识形态偏见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焦虑等成为阻碍“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路径”等实践与规范在国际层面进行扩散的结构性制约因素。既有研究鲜有从民间外交的维度来讨论如何通过更为平民化、灵活多元的传播路径创新使基于生态文明的“中国绿色治理规范”能够把握群众,走入民心。民间外交即不具有国家正式外交资格的非国家行为体(包括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高校、智库、企业及企业联盟等),以外国的非官方机构、组织和个人为主要对外交往对象,旨在配合官方外交并赢得国际民心民意支持的对外交往活动。^①民间外交凭借其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和合作模式的多样化,可以更好地消除国际误解、得到他国人民普遍认可,使习近平生态文明理念以一种更加平实、接地气、具体、清晰的方式完整地呈现出来,从而促进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理解和广泛认可。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化蕴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多种场合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他在总结人类文明兴衰史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科学论断,^②形成了包含生态生产力观、生态民生观、生态安全观以及生态法治观等在内的生态文明思想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理念既立足国内可持续发展,又放眼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不仅具有国内政策指向引导,同时还具有重要的国际化蕴意。生态文明的国际传播,不仅是讲好中国绿色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彰显中国自信的现实需要;同时还是中国积极引领并创建一种基于更加和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全球生态环境安全共同体的必然选择。

(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世界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是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理念支持,也是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命运共同体建构的绿色引擎,这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化维度和中国的全球生态责任观。具体而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世界价值体现为如下三个维度:

第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有利于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并强化绿色国际话语权。在全球环境治理中,西方国家作为工业文明的先行者,一直占据全球治理模式的话语制高点。目前,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使资源与环境对经济社会的约束日益收紧,资本逻辑驱使下的生态治理路径一度陷入困境。特别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提供国际绿色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都呈现快速下降的势头,突出体现为2017年特朗普政府公然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并放弃之前的气候援助承诺。随着全球权力格局的变迁,在全球治理中日益拥有更大权重的发展中国家不仅要在全球生态善治实践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还要提升其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制度性权力和话语影响力。尽管如此,西方社会对中国模式的意识形态偏见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焦虑等一直成为阻碍“中国治理理念”和“中国最优实践”顺利进行国际传播与扩散的结构性因素。在此背景下,全球生态文明的话语诠释及国际传播是我们把握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战略机遇期的必然选择: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可以更为有力地回击西方社会大肆制造的“中国生态威胁论”和“中国资源掠夺论”等消极论调,同时还可以更为积极地争夺国际舆论阵地和占据规范道义高地,从而有效强化我国的绿色国际话语权。例如2019年9月,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与《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娜·帕斯卡·帕梅尔共同发布2020年《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主题为

^① 俞新天 《论新时代中国民间外交》,《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6期,第40-55页。

^② 赵超、董峻 《习近平:生态兴则文明兴》,2018年5月21日,http://env.people.com.cn/n1/2018/0521/c1010-30002135.html 2018年10月17日。

“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不仅顺应了世界绿色发展潮流，表达了全世界人民共建共享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愿望和心声，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明世界意义。

第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可以让世界各国更加了解中国在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中国的绿色和平崛起提供良好的国际社会环境。中国在全国和地方各级的生态文明治理实践均取得了显著成就。根据联合国环境署合作中心与彭博新能源财经共同发布的《2018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趋势》报告，中国稳居世界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风能、光伏、生物质能等）和可再生能源绿色投资的首位。2018年太阳能投资大幅上涨的主要推动力是中国，中国新增53GW装机容量占全球新增装机容量的一半以上。^①中国在签署《巴黎协定》时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自主贡献目标，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以森林蓄积量为例，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2019年2月所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得益于国家造林工程的贡献，2000—2017年中国的绿化净增长率处于世界首位（17.8%），其面积占据了全球绿化增长面积的25%。^②又如2017年中国成功开启全国统一性碳排放交易体系，仅被纳入的首批电力行业的碳排放总量就达30亿吨，碳市场交易总体规模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③这些成功的绿色治理实践都为生态文明理念做出了具体性、生动性的诠释，并为推动绿色最优实践的国际扩散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生态文明理念的国际传播也有助于国际社会深刻认识到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改革和绿色治理新秩序建构中所做出的切实性绿色实践努力和重要性绿色智慧贡献。

第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还可以为世界各国，尤其是为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矛盾还比较突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化传播强调全球生态共同体的建构，在理论层面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态维度，在实践层面集中体现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④“一带一路”参与国大多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或属于新兴的经济体，这些发展中国家均存在着基础设施落后、生态环境脆弱等问题，他们在减贫、能源安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灾害管理等领域依然缺乏资金和技术，可持续发展能力薄弱，日益严峻的环境生态问题严重制约了社会整体性发展和进步。基于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融合和内嵌有助于带路沿线生态命运共同体建构，而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也是分享生态文明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随着习近平生态文明理念国际传播的不断深入，“一带一路”的生态最优实践的有效性和可复制性可以推进基于生态文明理念的话语实践和绿色规范在带路沿线国家快速扩散，为广大沿线发展中国家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重要的路径参考和经验借鉴。不仅为“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的绿色发展带来巨大机遇，同时也从根本上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于生态文明理念的认可度。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处于国际话语权建构的关键战略期，全球治理困境的系统性需要、中国内在的绿色实践基础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绿色经验借鉴需求都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以及打

^① Frankfurt School-UNEP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Climate & Sustainable Energy Finance et al., “Global Trends in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2018”, 11 May 2018, <https://economic-policy-forum.org/global-news/global-trends-in-renewable-investment-2018/>, accessed on 27 July 2018.

^② 《NASA发现中国变绿了，它们才是植树界真“大腿”》，2019年3月12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3-12/doc-ih-sxncvh1953383.shtml>，2018年5月16日。

^③ 《低碳天下：全国碳市场中的电力行业》，2018年1月，<http://www.tanjiaoyi.com/article-23687-1.html?from=app> 2018年5月29日。

^④ 自2013年习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经过六年的发展，截止到2019年4月，中国已经累计同125个国家、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73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造全新的全球环境治理话语体系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①在生态文明国际传播中,我们不仅要利用好来自国际环境治理需求和国内绿色发展的双重支持性动力,同时还需要通过多元传播方式创新加速将中国的绿色实力转化为绿色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化蕴意的内涵层次

习近平主席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②他强调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全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同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③深度扩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影响、全面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构成了新时代生态文明战略的重要任务。生态文明的话语传播是应对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格局中中国话语缺失的迫切需要,是我们把握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战略机遇期的必然选择。具体而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化蕴意包括三层重要含义:

首先,生态治理理念和实践层面的国际化。面对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要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绿色发展;同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以实际行动来引领国际“环境与发展”新格局与“美丽世界”的环境善治模式。全球环境治理的国际需求与国内低碳治理实践的积累不仅为生态文明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动力基础,同时也是推进生态文明话语体系不断发展演进的题中之意。整体而言,生态文明理念所承载的规范的扩散必然伴随着相应的绿色最优实践、绿色准则和绿色标准的推广,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在生态指标体系研究、绿色公共产品供给、国际环境援助、南南合作创新等领域做出更多的治理性示范作用。

其次,基于环境正义的治理体系重构层面的国际化。中国所主张与推动的“五位一体”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并且将其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基于此,生态文明理念的国际化进程必然需要我们在联合其他伙伴国家推进全球环境善治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推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现代化战略与生态环境保护战略进一步密切结合,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如通过南南合作中清洁能源技术转移来帮助其认识到生态环保内嵌到社会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和共赢性。另一方面,通过强调环境正义来克服目前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南北差距”,这意味着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同时,旨在努力创建一种基于更加和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全球生态环境安全共同体。^④

再次,话语传播路径层面的国际化。在全球治理理念日益多元且相互竞争的背景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吸引力、思想感召力和实践生命力有赖于全球传播体系的系统性建构,使其传播得到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及其民众的认同。^⑤中国目前较为重视通过政府间交流和官方平台的建构来推进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并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问题上的话语权。但是要把“以人为本”“多元包容”的理念真正体现在中国对外关系的具体实践上,还要特别注意代表广泛民意基础的民间外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⑥民间外交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其传播方

① 李昕蕾《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其国际传播》,《中国生态文明》2018年第5期,第88-90页。

②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会开幕 习近平致贺信》,2013年7月20日,http://www.china.com.cn/news/politics/2013-07/20/content_29481331.htm,2018年3月9日。

③ 《习近平向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8年年会致贺信》,2018年7月7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7/07/c_1123092421.htm,2018年8月7日。

④ 郁庆治《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全球资源环境安全文化构建》,《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1期,第4-11页。

⑤ 刘立成、熊莉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全球传播体系建构》,《学习月刊》2018年第9期,第11-14页。

⑥ 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习近平在全国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第1版。

式更为多元，有利于克服单纯官方外交的刻板与僵化的形式，更加符合目前国家话语传播中的“平民主义”转向。在生态文明理念的国际传播过程中，我们要积极推进非国家行为体和次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国际接触与多轨沟通，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超越西方器物、制度、文化的“全球化”，从而实现源于东方文明的“再全球化”，^①在寻求与西方价值体系的相通性对话的同时建构“生态文明的绿色和谐世界”为特色的话语传播路径创新。

二、民间外交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中的角色定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外交提出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强调形式多样、贴近民心的民间外交可以成为官方外交的重要补充。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对外传播路径创新方面，基于“民心相通”的民间外交可以在多元交流、灵活互动与伙伴关系网络拓展中协助围绕“生态文明”的全球环境治理新秩序的构建。民间外交通过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将抽象概念具体化等方式提供务实可行的多元传播路径。如通过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多边治理活动，成为多轨外交中的活跃主体，传播承载生态文明理念的中国方案和最优实践。^②

（一）以人民为主体的民间外交在生态文明话语传播中更能讲好中国绿色故事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的贫困发生率已降到4%以下，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中国人民的素质空前提高，在对外经济、政治、文化交流合作中历练了同他国人民打交道的能力，因此对于融入世界和投入民间外交的热情和意愿空前高涨。这些都为形式多样的民间外交的开展奠定了稳定的社会基础。特别是进入网络时代后，普通民众的社会影响力日益提升；^③在国际局势不断变化、热点问题频生的今天，民意的变化更加迅速，新媒体的普及推动了民意的瞬息转向。要依靠民间外交，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开展基于“生态文明”的务实性中外交沟通合作，传播好中国声音，使生态文明理念的话语传播变得可亲、可近、可信、可融，从而塑造融通中外的绿色话语体系。

随着中国日益崛起，某些别有用心域外力量对中国进行“妖魔化”，给中国贴上各种负面标签，使他国人民也对中存心存距离感乃至误解。以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为例，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期间，英国气候变化大臣米利班德于利用国际媒体指责中方“劫持”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谈判进程，使中国面临严重的话语危机。^④此后，中国政府开始调整自身的谈判策略。自2011年德班会议以来，中国首次以政府代表团名义在气候大会期间举办“中国角边会”系列展示、交流与宣传活动。开始注重同非政府组织、本土社会组织、地方政府、研究机构以及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体合作，通过民间气候外交与国际社会展开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沟通与交流，向国际社会全面展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与进展。如在2018年波兰召开的卡托维茨气候大会上，“中国角”共计举办了25场边会活动，全面介绍中国在节能减排、绿色发展、推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实践与经验，^⑤推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气候变化内政外交的善意理解。

① 王义桅《中国对欧公共外交的使命》，《公共外交季刊》2010年第4期，第76-83页。

② 周鑫宇《全球治理视角下中国民间外交的新动向》，《当代世界》2018年第5期，第32-35页。

③ 王全权、张卫《我国生态文明的对外传播：意义、挑战与策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155-159页。

④ 直到两天后中国外交部才发出严正驳斥声明，但已经丧失媒体传播的最佳回应期。参见王彬彬《中国路径——双层博弈视角下的气候传播与治理》，北京：科学文献出版，2018年，第121-125页。

⑤ 关婷、黄海莉《卡托维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侧记》，中国绿色创新夏季学院，2018年12月14日，<http://wemedia.ifeng.com/93067858/wemedia.shtml>，2019年1月26日。

(二) 民间外交成为推进全球环境善治和传播生态最优实践的重要力量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西方所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呈现出一定的衰落态势,在应对各类全球问题时显示出能力与意愿的“双重赤字”。中国开始积极承担大国责任,维护国际秩序,推动全球善治,特别是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性作用。如通过南南合作模式创新来提供更多的全球环境公共产品,积极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应对气候变化等环境挑战。2015年起,中国承诺出资200亿人民币成立南南气候合作基金,在发展中国家开展10个低碳示范项目、100个气候减缓和适应项目及提供1000个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从实践上落实生态文明理念。

当然,这些全球生态治理蓝图的具体实施,不可能仅仅依靠政府层面的直接进行,往往需要发动跨国合作网络,把非政府组织、企业、城市等治理主体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使私营部门和社会力量成为推动全球环境善治不可或缺的力量。在全球多层治理中,作为根基的民间外交日益成为推进全球环境治理和传播生态最优实践的重要力量。民间外交日益成为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前沿性直接供给者,特别是在南南合作、环境外交、援助外交、灾难外交等领域为当地民众提供重要支持。多元的民间外交施动者能够深入他国社会基层,为当地民众提供日益个性化、多样化、周到细致的公益服务。如中国民间组织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GEI)^①通过授人以渔和融入社区的工作方式推进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和清洁能源发展等项目,为推进基于“生态文明”理念的地方低碳治理实践扩散和可持续发展模式创新做出了有益尝试。

(三) 民间外交发挥着促进生态命运共同体建构的能动性作用

在推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过程中,需要注重促进生态命运共同体建构,并提升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道义引领力。^②将绿色“一带一路”过程同基于生态文明理念的命运共同体建构相结合,对中国提升自身的气候治理的道义引领能力和气候制度性话语权具有重要支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民间外交可以作为气候公共外交的关键组成部分,统筹公私社媒力量,通过推进地方政府、本土社会组织同国际非政府组织、企业等私营部门、高校智库、国内以及国际媒体进行互动强化,从多元和多维角度来推进习近平生态文明理念的国际传播。

2016年9月,多家国内及国际智库、环保组织和公益基金会等单位启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平台,以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和《巴黎协定》为目标,着眼“一带一路”所涉及的生态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应对、能源转型、绿色金融和产业合作等领域的多元合作。^③在2017年波恩气候大会上,该平台组织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与气候治理系列边会,邀请了气候变化、能源、金融等领域专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代表,共同探讨带路绿色发展与气候治理相关的机遇与挑战。^④不仅吸引了众多机构和媒体的积极参与,也得到了带路沿线发展中国家以及相关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的关注。此类创新型伙伴关系的建构可以团结一切力量,通过更加灵活、务实的方式来推进国际社会对于生态文明理念实践的真切体验。在推动“一带一路”的绿色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同时,民间外交可以进一步

^① 2004年成立于北京市朝阳区的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GEI),其项目点分布于中国、东南亚和南亚等地区,旨在与政策制定者、企业家、科学家、民间团体领袖和地方社区一起,共同推动中国、东南亚以及非洲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参见 <http://www.gei-china.org/about-us/introduction-to-gei/>, 2019年3月17日。

^② 2017年5月,环境保护部、外交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是分享生态文明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气候脆弱型的发展中国家,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治理能力有待提升。

^③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平台项目介绍》,2017年1月13日, <http://www.chinagoinggreen.org/?p=6966>, 2018年12月15日。

^④ 全球绿色影响力《“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与气候治理系列边会·德国波恩COP23》,2017年12月1日, <http://www.chinagoinggreen.org/?p=7353>, 2018年11月6日。

带动生态文明理念在沿线国家的扩散和推广，帮助沿线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以及基于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绿色发展潜力。

三、生态文明国际传播中民间外交的复合挑战与路径创新

习近平生态文明的国际化意蕴意味着全球环境善治的实现需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全球传播，最终指向是创建一种基于更加和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全球生态环境安全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强调民众认同和生态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多元行为体参与的民间外交，有助于中国从更高的道义站位来提升自身绿色理念的接纳度，可以更为奋发有为地发挥引导性作用。

（一）民间外交在生态文明话语传播中所面临的复合性挑战

民间外交在中国对外话语权塑造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民间外交在对外话语塑造过程中也面临来自国际和国内层面的复合型挑战，在应对境外媒体和政治力量在“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气候责任论”等反华排华论调的炒作和渲染上，往往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

1. 民间外交话语塑造中的外部挑战

就国际层面而言，随着中国国力提升，周边区域内和域外大国通过加强同盟伙伴关系以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对我国生态文明理念与实践也采取了一种质疑和对抗的态度。特别是某些西方国际非政府组织同当地社会组织相联合，就环境保护、资源开放、社会公平等议题对中国发难，强化了周边小国对中国周边发展的敏感性，将中国生态共同体和绿色发展的外交理念妖魔化为旨在攫取资源的变相的霸权主义。^①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更为注重政策沟通和基础设施建设连通，而对于有助于促进民心相通的民间外交关注度有限，导致周边国家对华好感度持续下降。然而中国周边国家是全球中产阶级人口发展最快的地区，鉴于上层精英的政权时常更替，对民众的影响是建构外交根基的关键。只有大力开展有效的民间外交，才能把中国的善意、文化和价值更好传播到“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坚实的社会民意基础。

具体而言，民间外交在生态文明话语塑造上面临以下两个突出性问题：首先，“一带一路”周边地区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然而目前中国民间外交的活动区域过于侧重发达国家，相对忽视周边发展中国家。^②同时，中国社会对于亚非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总体上来说仍然缺乏了解，不仅语言交流上受限制，还缺乏与一些较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深入交流的能力。^③其次，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缺乏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和“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民间外交意识，不善于针对当地的社会民心开展互动。尽管“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企业的活跃程度不断提升，但在承载“生态文明”绿色内涵的企业社会责任发挥、气候适应能力提升、当地环境改善等具体实践领域，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同社会组织的联合互动的程度均较低，难以形成民间外交活动的长效性合作平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涉及到“民心相通”的民生、环保、可持续发展建设等关键领域，中国非国家主体受其对外交流能力的限制而将舞台拱手让与很多西方国际非政府组织。

2. 民间外交话语塑造中的内部挑战

^① 张梦露 《中国推进“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的挑战与路径》，《公共外交季刊》2016年第4期，第38-42页。

^② 如自2005年“中欧气候变化战略伙伴”成立以来，中欧民间外交配合官方外交的气候和清洁能源合作项目日益增多，代表为2010年建立的中欧清洁能源中心（EC2）和2012年建立的中欧清洁与可再生能源学院（ICARE）。2018年的《中欧领导人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联合声明》中进一步强调了民间力量和私营部门的重要性。

^③ 储殷 《当代中国民间外交的错位及其解决思路》，《对外传播》2016年第5期，第8-9页。

除了目前国际层面的新形势和新挑战之外,民间外交在推进生态文明的话语塑造中还面临很多来自于自身发展局限的挑战。首先,中国民间外交的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能力和资源动员能力欠佳。作为民间外交的重要参与力量,中国社会组织同西方相比,其国际化道路还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国际化视野有待拓展。为了获得国内民众的更多支持,以及受到外出资金预算、国际人才匮乏等诸多限制,中国多数社会组织的工作重心还是倾向于国内环境议题,对于全球环境治理中的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议题关注度不高且参与度有限。国际交往主要停留在被动性的接待、外访等日常外事活动层面,主动“走出去”的民间组织有限。即使有些组织走出国门,由于对国际形势、国际规则、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规律了解不多,对于如何策划同生态文明相关的活动、如何同国际媒体合作、如何进行话语转换等方面均缺乏经验;更不要提在国外真正扎根,设立自己的国外分支机构,充分融入到当地基层民众之中。

其次,民间外交的话语转换能力及外交实践融合力较弱。中国政治制度独特、历史文化悠久、话语体系具有自身特色,国际受众对于中国的话语体系中特有的话语内涵、文本范式、语境渲染、表述风格并不能够完全了解和理解。即使是“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在联合国文件中有标准的英文翻译,但是普通外国民众仍然很难明白其真正的内涵,这就需要我们重视民间外交中不同话语体系之间实施更为达意确切的中外话语转换。任何语词生产都是在一定政治语境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在传播“生态文明”理念时必须将中国的传统文化阐释同全球环境治理困境结合起来,尤其要注意纠正西方媒体和社会组织对中国话语文本的误判、误读、误译。中国国内话语体系的政治性、理论性、宏大性特征相对明显,而国外民众则更容易接受更为平实的普通人叙事风格,因此生态文明话语在对外传播过程中要注意结合国际受众人群的自身需求和知识结构特点。^①另外,在当前中国的民间外交中,话语宣传的外交实践融合力较弱,存在着严重的“最后一公里”障碍。在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地群众很难将“生态文明”之类的中国抽象话语同中国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当地的绿色实践联系起来。

(二) 推进生态文明话语国际传播中的民间外交路径创新

在推进生态文明的话语传播过程中,在多轨外交体系中建构集体认同是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關鍵。在生态文明的国际传播领域,民间外交路径创新可以使我們形成不同于传统帝国主义的新型民主或环境友好力量,在国际社会获得广泛认可的话语性权力。

1. 生态文明国际传播中民间外交的参与保障机制创新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话语的国际传播过程中,要注重民间外交参与主体的国际化进程,通过法律体系和政治制度完善来保障本土社会组织、企业、智库等多元行为体在“走出去”国际化的过程中能够有所依靠、理性有序且相互协作,从而为其承载生态文明理念的气候(环境)外交、清洁能源外交、援救外交等奠定基础。^②

习近平生态文明理念的国际化和平民化过程必然是中国民间外交参与组织国际化和传播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在推进民间力量国际化的进程中,首先需要从法律上保证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参与,特别是社会组织参与国家环境灾害和气候灾难等对外援助工作的立法工作。即在完善相关法律的基础上,以推进社会组织参与气候援助为突破口,通过“民办官助”的形式推进社会组织等参与国际化的气候治理项目。要大力推进如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等组织在发展民间外交,推进生态文明理念国际传播中的桥梁作用。这意味着

^① 胡宗山 《中国国际话语权刍议:现实挑战与能力提升》,《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5期,第127-135页。

^② 于宏源 《民间外交主体的理论探讨》,《国际观察》2018年第5期,第79-93页。

调动多元行为体积极参与到承载着“生态文明”理念的各类民间外交活动中，使其大胆活跃地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对话，提高国际行动能力，积极参与各种国际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这意味着发挥政府的引导与保障作用更加势在必行。其中需要注意的是，政府需要就生态文明国际传播方面来设置项目、凝聚资金和人力资源，为社会组织、企业、智库等走出国门给予各项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鼓励那些资源实力较强、具有较多国际交往经验的群团组织，主动利用国际资源提升自身的话语影响力。加入国际和区域社会组织联盟与环境治理团体，特别是争取国际组织的咨商地位或参与国际机构社会组织委员会（或工作小组）等，从而获得更多的机会参与国际事务和议程设定。利用国际媒体的发声渠道，将蕴含“生态文明”精神的中国故事讲得更加精彩，更加深入国外民众的内心。

2. 生态文明话语传播领域及传播方式的创新

生态文明理念传播领域及传播方式的创新意味着民间外交关注的领域需要日益国际化和多元化，特别是随着信息革命和数字技术的发展，生态文明理念在自媒体和大数据时代的话语传播方式也应更加丰富多样。

首先，就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传播领域创新而言，主体参与日益多元化的民间外交在对全球环境治理的关注领域上也日趋国际化和开拓化，延伸到气候变化、清洁能源、海洋污染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环保教育、风电/光伏扶贫、低碳产业等多个领域。特别是随着中国民众环保意识强化、可再生能源发展增速、低碳城市和碳交易的蓬勃兴起等，中国民间绿色外交和绿色援助已成为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重要践行内容，成为中国绿色软实力建构的重要抓手和最新亮点。基于此，一些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等可以成为中国气候援助和可持续发展建设的排头兵。企业同社会组织可就海外企业社会责任培训展开合作，将基于当地民调的社会需求同当地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从当地环保、绿色能源供应、节能建筑、应对气候灾害能力、可持续产业发展等多元领域将绿色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到实处，增进了国家间信任感。^①这种真正融入当地社区的工作方式不仅使当地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也使当地政府和公众对中国产生了好感。

其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传播方式创新意味着国际传播方式的网络化和多元化。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包括微信等新媒体）逐渐成为民间外交中重要传播手段，在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跨界、跨行、跨组织、跨媒介等新的传播方式有助于推进民间外交中所承载的价值规范（如生态文明规范）的社会化进程。^②我们要注重挖掘数据网络外交的潜力，将各类社交网络资源通过微信和微博等新型传播手段调动起来，如在海外主流社交平台 Facebook、YouTube 和 Twitter 开设账户，可以有效实现媒体传播渠道的平民化和本土化。^③除了呈现出的网络化特征，我们还需要不断探寻如何在国内外各种不同的受众之中进行有效的、对方喜闻乐见且容易接受的方式来开展民间外交，如同生态文明相关的海外中国低碳中心建设、国际生态会议的召开、清洁发展合作项目施行和生态低碳项目示范、青少年绿色实践交流、跨国农村气候适应能力提升等等。总之，民间外交在推进生态文明的传播过程中要贴近不同国家的发展实际状况，理解并回应相关国家的利益关切，不回避关键问题。通过切实可行、灵活多样的生态文明民间外交实践来改变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刻板认识，^④注重国外传播过程中调动普通民众的参与度，推进以生态文明为代表的中国理念和绿色规范的全球扩散。

^① 李昕蕾、于宏源 《民间外交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的协同作用及其传播机制创新》，《当代世界》2017年第9期，第34-37页。

^② 从网民规模上看，截至2018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上升为8.29亿，全年新增网民5653万，互联网普及率达59.6%，较2017年底提升3.8%。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17亿，占比98.6%。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8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9年2月，http://cnnic.cn/gywm/xwzx/rdxw/20172017_7056/201902/W020190228474508417254.pdf，2019年5月19日。

^③ 吴建民、于鸿君 《中国民间外交发展报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296-299页。

^④ 陈小鼎 《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的国际话语权塑造》，《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85-94页。

3. 生态文明长效性外交传播平台的模式创新

话语平台是进行生态文明话语传播和接受话语反馈的载体与渠道,建设长效性话语平台对于提升中国在全球环境善治中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中国不仅要积极地参与既有的多边多维的国际合作平台,同时还需要巩固和发展由自己创立的网络化长效性传播平台。^①

首先,我国民间力量对现有重要国际合作平台的利用效率较低,尤其是未能充分利用地区组织与国际组织的整合作用,中国特色难以转化为国际共识。当然,近年来中国官方逐步认识到拓展话语平台的重要性,通过联合国会议、二十国集团(G20)、亚信会议、上合组织等重要多边平台将中国以“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创新性理念融入区域合作与全球治理,彰显中国道路的时代价值与世界意义,但是对于民间力量的注重程度仍有待提升。如G20作为重要的大国治理协调机制,也在不断发展深化中推进市民社会领域的交流合作。2013年俄罗斯举办的G20会议议程中开始设立二十国民间组织峰会,即C20(Civil 20)。随后的G20峰会举办国澳大利亚、土耳其、中国以及德国和阿根廷都延续了这一做法,逐渐形成了C20机制。该机制使民间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也成为各国民间力量进行话语权博弈的新舞台,能否将“生态文明”理念通过多元民间力量推向国际社会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的理念吸引力和国际认可度。

其次,要注重建构中国主导的包括多元伙伴关系在内的长效性生态文明国际传播平台,更多发挥主场外交的作用,通过注入更多中国元素来推动国际话语规则重构和再塑,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争取更多有利条件。在这一方面迈出较大步伐的当属2009年成立的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Eco Forum Global,简称EFG)的创立。2013年该论坛成为经国家批准的唯一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高端平台,其目标是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分享生态文明建设经验,促进环境政策的制定、完善、落实;应对生态安全的挑战,促进形成国际、地区和行业的绿色议程,从而提升全球践行和传播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动力。其独特的优势是为推动国内和国际、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合作搭建桥梁,提供了一个传播理念、把握政策走向、分享知识与成功经验的跨国界、跨行业、跨学科专业的高端平台。^②不过,目前论坛仍处于转型期,在国际上对普通民众的影响还不够深入。政界、商界、学界的代表仍然构成论坛的主要参与群体,普通民众的了解程度并不高。在今后的发展中仍需要通过邀请全球各国的民众力量参与论坛中不同形式的活动,充分体验、感受与认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又如上面所提到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平台等都属于生态文明话语传播平台建构过程中的有益尝试,但是这些既有平台在长效性制度化建设、伙伴关系网络拓展以及民间力量的调动等方面仍有待提升。

(责任编辑:林日杖)

^① 李昕蕾、于宏源《民间外交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的协同作用及其传播机制创新》,《当代世界》2017年第9期,第34-37页。

^② 自2009年以来,EFG已与诸多联合国机构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UN-HABITAT)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等以及国际组织如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倡导地区可持续发展国际理事会(ICLEI)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以及跨国公司、国内外著名大学、媒体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Abstracts

The Factor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civilization

HUAN Qing-zhi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cases of citation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elaboration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civilization, from the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schools such as the Confucianists, the Taoists and the Legalists as well as their major scholars to the various literary classics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ifu. In doing so, it is very much helpful for u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to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nd policy connotations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civilization which will play a guid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especially its viewpoints of na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By and large, however, the main role wha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factors act is to decorate or rich the discursive context or elaboration style, rather than to constitute an independent dimension of this thought system.

Study on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ANG Yu-chen

Abstract: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result of inheriting and creatively developing western ecological philosoph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ecological wisdom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contemporary China's development and Marxist theor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it finally forms a systematic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Different from western "dark green" and "light green" ecological trend, due to the different theoretical basis and value pursuit,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shares a series of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value pursuit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e value purpose of environment and people's livelihood,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productive forces which reasonably solv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ist ecological governance conception which combines morality and law.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not only requires us to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follow the path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ut also to integ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to the country's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whi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Implication of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and the Communication Path of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LI Xin-lei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is an urgent need to deal with the lack of Chinese discourse in the glob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t is also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us to grasp the strategic opportunity period to enhance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

er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people's support, the flexible and diverse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could be a useful complement to official diplomacy. It could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diffus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enhance the recognition of foreign people in a way of "moistening the things silently". At present, China's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is still facing complex challenge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discourse dissemin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dynamic role of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in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s,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communication capacity of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and foster the innov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mode. This includes the innovation of participation guarantee mechanism for the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dissemination field and mode innov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iscourse, and the innovative construction of long-term communication platform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search on Subject Position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LIU Li-li, YANG Yin-zi

Abstract: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is a systematical engineering, which requires multi-subjects, such as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farmers (or farmers' organizations) to play their respective roles jointly. In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on government offside, enterprise dislocation, lack of farmers' subject positioning. Role positioning has become the key point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Therefore, it's necessary for the government to step back appropriately, the enterprises make a concession, the farmers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to guarantee the three subjects play their respective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The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and the overall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can be realized.

Xi Jinping'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n the News Public Opinion of CPC

DING Bo-quan

Abstract: Xi Jinping's thought of news public opinion has both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original view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 Adhere to the Party principle of journalism. Xi Jinping's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n this issue i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which is "consistent and unified". (2) In all cases, we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work of public opinion. Many of Mr. Xi's important statements on public opinion have not been made before. (3) To play the function of the news media as the mouthpiece of the Part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Xi Jinping is talking about the party media as the "throat and tongue"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4) Adhere to positive publicity-oriented and pay attention to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 Xi called for positive publicity to be the main focus on enhancing attractiveness and appeal, stating that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 and positive publicity are unified". (5) Always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news authenticity. Mr. Xi demands that "facts should be described according to facts, and that individual facts be accurately reported, but also macro-view of events or things." (6) Follow the law to bring the work of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to a conscious state. (7) Put forward a new proposition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edia integration. (8) Put forward the exhibition of China's image and expand the international